

中國近代 民族史學探源

李朝津 著

近代史學研究 1



出版社

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李朝津 著



蘭臺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 李朝津 著-- 初版

臺北市：蘭臺出版 2014.12

ISBN 978-986-5633-00-4 (平裝)

1.辛亥革命 2.民國史 3.史學評論

628.19

103023145

近代史學研究 1

中國近代民族史學探源

作 者：李朝津

編 輯：張加君

美 編：高雅婷

封面設計：謝杰融

出 版 者：蘭臺出版社

發 行：蘭臺出版社

地 址：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21 號 8 樓之 14

電 話：(02)2331-1675 或(02)2331-1691

傳 真：(02)2382-6225

E-MAIL：books5w@gmail.com

網路書店：<http://bookstv.com.tw/>、華文網路書店、三民書局

<http://store.pchome.com.tw/yesbooks/>

博客來網路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總 經 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劃撥戶名：蘭臺出版社 帳號：18995335

香港代理：香港聯合零售有限公司

地 址：香港新界大蒲汀麗路 36 號中華商務印刷大樓

C&C Building, 36, Ting, Lai, Road, Tai, Po, New Territories

電 話：(852)2150-2100 傳真：(852)2356-0735

總 經 銷：廈門外圖集團有限公司

地 址：廈門市湖裡區悅華路 8 號 4 樓

電 話：86-592-2230177

傳 真：86-592-5365089

出版日期：2014 年 12 月 初版

定 價：新臺幣 360 元整（平裝）

ISBN：978-986-5633-00-4(平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謹以本書獻給雪意、康權與蕙心

序

本書要談的重點是清末民初期間中國世界觀轉變過程。誠如清末名臣李鴻章所言，近百年中國面臨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然所謂大變局是指那一方面？有人認為是現代對傳統的挑戰；有人認為東西兩個差異文化的衝突；亦有人認為是帝國主義擴張，威脅到國家的生存。上述說法都有它的道理，不過個人認為西方給予中國最重要的影響，應該是世界格局的變化及其隨之而來的世界觀。中國是東亞大國，但其所以能君臨整個地區，不單在軍事、政治及經濟力量，更在於它能建構一個國際體系與及支持上述體系的世界觀，然西力東來，對中國最大挑戰便是它的國際架構，亦即是崛起於歐洲之民族國家制度。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過去多半認為其拋棄傳統體制、走向民族國家是必然之道。但近年的研究則指出民族國家並非必然之世界秩序，同時東亞體制亦並非全然被捨棄到歷史的墳墓裡。個人是同意此一觀點，亦即民族國家是歐洲特有歷史背景產生，中國在接受此一體制時，為適應本身環境，必有所去取，更企圖重新改造，但此方面在歷史界談的比較少，亦是本書要探索所在地方。

中國之傳統國際體系具體呈現是甚麼？一般都會使用「朝貢制度」概念。它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周代，即《詩經·小雅·北山》所提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朝貢制度是否真實存在於中國歷史上，學術界卻有很多爭議。美國費

正清、日本濱下武志均主張朝貢制度是中國處理對外關係重要體制，其影響及於整個東亞及東南亞。費正清認為中國透過貿易優惠政策以吸引外國朝貢，從而建立一個東亞世界秩序；濱下則更具體指出朝貢制度不單止是中國，也是亞洲共有制度，並未因西方力量進入亞洲而消失，其影響力與西方共存。¹但夫馬進及 John Wills 則認為中國朝貢制度歷代均不同，很難用一個劃一標準去規範。²的確，要說中國在數千年中，其對外體制完全沒有改變似乎很難令人信服，但亦不能說它只是個臨機對外方式，因為它的世界觀必然會提供一套價值體系，而且有其延續性。何偉（James Hevia）提出一個很有參考價值的說法，他認為朝貢制度是一套禮制，它提供一個協商的平台，讓中國與外國交往過程中有協商的空間。對何偉亞而言，禮儀並非西方常認知為純粹權力的象徵，它是文化中宇宙觀的反映，所謂朝貢制度，只不過是各個文化交流的中介而已。³

由於篇幅及個人現行研究課題關係，本書無法討論傳統朝貢制度，重點只能放在傳統世界觀在接觸到西方思想後所產生之變化。所謂西方思想，主要指十九世紀以來民族主義及自由主義兩

¹ John K. Fairbank,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4th edition, enlarged), pp. 158-63; 浜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² 夫馬進編，《中國アジア東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市：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7）；John E. Will, "Tribute, Defensiveness, and Dependency: Uses and Limits of Some Basic Ideas about Mid- Ch'ing's Foreign Relations," *American Neptune* 48(1988): 225-29.

³ James L. Hevia, *Cherishing Men from Afar*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個重要思潮。本書第一章裡便談及兩個主義對近代史解釋的衝擊，它的意義其實更大於此。透過歷史的解釋，自由主義者及民族主義者企圖為中國尋找一個現代國家模式。自由主義強調傳統中國是一個對內封建專制，對外不尊重萬國平等的制度。要建立現代化國家，必需去除傳統。蔣廷黻是自由主義者中較為溫和，因此一度支持中國實行獨裁政體，但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仍是他解釋歷史的重要架構。民族主義則追求一個同質的國家，但民族主義者自始便要面對一些無法解決的難題，不單止民族範疇難以具體界定，世界上也沒有幾個國家能純粹由單一民族組成，因此民族主義者可以分化為本質主義者，如錢穆一直在追尋中國民族精神的所在；另一種則如蕭一山者，希望把歷史建立在未來上。在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的交錯挑戰下，中國的傳統世界觀並沒有全然消失，但它的起伏一直缺乏學界關注，因此本書以十九世紀末至五四運動的思想變遷為主軸，作一個簡單的疏理。

本書第二章便以十九世紀王韜作為討論中心。王韜一向被視為洋務派的代表，由於他在香港的經歷及與西方文化有深入的接觸，使他成為同時代人西化的先鋒。無可否認王韜的確極力主張吸取西方的先進知識，但在國際問題上，他可以說是相對的保守。他反對西方富國強兵，弱肉強食的想法，主張國際責任是濟弱扶危；他主張中國改革以自保為主，擴張並非優先任務；他亦使用傳統用語「大一統」，好像要恢復朝貢制度中君臨天下姿勢，但事實上他承認各國有自主之權，只不過強調一個全球的共通價值，因此他的看法反而接近傳統被視為保守派的王闓運。在書寫本書課題時，本來有意探討王闓運案例，但由於時間限制，只能中

途作罷。⁴不過王闢運追求今文經學倡導的大一統思想，在現實政治中亦主張內治優先，與王韜並無二致。因此在研究晚清思想史，用傳統進步及保守二分法來論述，反而忽略所謂進步派與保守派的共通點，他們事實上仍處於同一個語境中，維持一元世界是其共同願望。

甲午戰爭是傳統世界觀轉向民族世界一個十分重要轉捩點，當然也非一蹴即至，康有為便是個過渡時期人物。有關康有為評價，常囿於他與革命的關係，特別其對民族主義的批判，因此康氏始終被烙上保守的印記，只有蕭公權及其弟子汪祖榮給予它一個較為公平的評價。事實上康有為在近代思想史上仍應佔一席位，在某種意義下，他可以說承先啟後，力圖整合傳統天下與近代民族主義的人。康有為可以說晚清少數追求中國國家起源的知識分子，並首先提出黃帝為中國國家之締造者，若比較他與馬驢的《繹史》，康有為受到西方啟蒙時期思想的影響十分明顯。但康有為在另一方面又試圖建立一個普世原則，其所謂普世原則，無疑是建基於近代自然科學上，但他的表達方式仍沿襲宋明理學的形式，以「道」作為其統括概念。雖然康有為提出人道一詞以求有別於過往的道，但仍語焉不詳，廖平為康有為提供一套公羊學的世界觀，惜足補其缺陷，亦是康有為急速轉向公羊世界觀的重要原因。

⁴ 近年有關王闢運之研究漸多，但多由經學入手，少注意及他的外交觀，見魏綠瑩，《世變中的經學：王闢運春秋學思想研究》（台北縣：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劉少虎，《經學以自治：王闢運春秋學思想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2007）；劉平，《王闢運春秋公羊傳箋學術思想研究》（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12）。

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正式開花結果是在辛亥時期，尤其在1900年庚子事變之後，但對上述主義的詮釋卻五花八門，各人自有心裁。籠統而言，可以分別以梁啟超、章太炎及孫中山為象徵，代表國家派、歷史文化派及公民派三個不同之路向。梁啟超是近代首先提倡激進人民概念的人，在戊戌政變以前，梁啟超對人民的理解仍以反對君主專制為主，直到政變失敗後逃往日本，直接接觸日本情況，才給予梁啟超更大啟發，主張建設中國為民族國家。亦由於民族意識的滋長，梁啟超亦是最先討論重建中國史學的人。但梁啟超探討文化層次的史學不長，很快便轉向建國的各個面向，對辛亥時期的梁啟超而言，政治建設比文化重要，主要原因有兩個，首先是列國競爭，國家若不強大，個人亦無法生存，由主體所產生之文化活動亦不能存在，在社會達爾文競爭法則下，群體不能不超越個體。其次為滿漢衝突，透過國家機器，可以調和種族矛盾。亦由於梁啟超強調群體重要性，對革命派是無法接受。不過梁對群體演進的解釋，仍可以看到康有為之影子，所謂三十之後絕對不談公羊，只是他未有覺省到康氏的影響。

章太炎是辛亥時期歷史文化派的主要代表，章氏最大的貢獻有二，其一是利用其嫻熟的清代小學，建立一個由黃帝開始的四千年民族譜系，並創造一個文字語言的歷史敘事，打造一個新史學傳統，取代過去以經學為主的文化論述；其次為建立中國民族主義之主體性，以言語作為基礎，章太炎強調中華民族是由個體自然結合，但民族的傳承因滿清統治而中絕，只要光復歷史傳統，中華民族即能復興。章太炎非如梁啟超把群體置於個體之上，是其能夠吸引當時青年知識份子的原因，但章太炎在建構其民族

理論過程中，遭到維新派的挑戰，康有為認為歷史上外族入佔中國案例不少，民族成份因而混淆，章氏所謂的民族單純性根本無法維持。為回應康有為的挑戰，章太炎必須解釋個體與民族之不可分關係，亦即民族歷史雖經多次變化，仍能維持個體的同質性。因蘇報案入獄之章太炎，其間潛心佛學，開始借助唯識派之世界觀，由名相入手，指出主體雖根於語言，但語言只是一個符號，可以包容不同主體，但愈象徵化，其自然性亦越受質疑，最後章太炎只好求助於莊子，以「不齊為齊」，不再追求世界之統一，回歸到說經為樂。魯迅指其在民國時期「漸入頹唐」，但把原因歸究到「既離民眾」，⁵似忽略章氏在思想史上所面臨困境。但無論如何，章太炎在主體的追尋上，卻為現代中國心性之學開闢一個新的門徑。

辛亥時期第三類派別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他們與章太炎類似，強調個體在民族主義之主要作用，但不同點是章太炎由形而上學建設主體，但孫中山等人則以國家為主體性所在。由於時間不充份，個人無法深入討論清末革命派的想法。但在民初章士釗與戴季陶有一場政治爭論，足以反映兩者間的差異。章士釗與章太炎關係密切，而其思想亦與其接近，強調歷史有其承傳性；戴季陶自號為孫中山思想繼承人，強調國家基礎建立在天賦人權上。章士釗與戴季陶之爭，始於民初內閣制之爭，章士釗主張內閣制，認為合乎歷史溫和進化之用，戴季陶則批評所謂內閣制之爭，完全是袁世凱的陰謀。戴季陶代表革命史觀正統，反映出過

⁵ 魯迅，〈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陳平原編，《追憶章太炎》（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頁49。

去有關民初歷史，常過份圍繞袁世凱問題，爭議的本質反而煙沒。兩人的差岐，主要是章士釗強調國家的成立是歷史逐步發展而成，而且國家是一有機組織，個體無法擺脫歷史的羈絆。雖然章士釗尚未如梁啟超認為國家在個人之上，但其歷史密切性亦無法使人擺脫國家。而戴季陶則主張國家為人民自由意志的集合體，而其意志則呈現於憲法之中，完全為盧梭天賦人權論的反映。歷史文化派與公民派在清末面對一個共同敵人，尚能勉強和衷共濟，當革命成功，其差岐便漸顯現，亦成為新文化運動一個重要源頭。

本書要處理最後一個問題是新文化運動的源起。從來談新文化運動，不少研究關注其民初的新興社會及經濟背景。社經問題的重要性當然不能忽視，但新文化運動是以思想為主，它的源起以至內涵更應該關注。有人認為它是一個啟蒙運動，不過在辛亥革命時期，西方啟蒙已經開始，則辛亥的啟蒙與五四的啟蒙究竟有何差別？不釐清這個問題，是無法理解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的脈絡。事實上二次革命的失敗，對革命黨人與及胡適等知識份子的衝擊是十分激烈，需重新思考辛亥革命的建國路線，亦即所謂歷史國家的建立。過去一直以為新文化運動就是反封建運動，其實五四啟蒙要打破是辛亥革命所帶來的歷史性，並非以四千年來的傳統為對象。無論胡適或陳獨秀，都希望擺脫歷史國家的限制，探討人類的共通性，此為傳統與現代分裂的起源。但胡適在新文化運動所產生更大影響的原因，在其能具體刻劃出個體性之所在，辛亥時期之個體是源自於政治架構，亦即歷史國家，但胡適所刻劃的個體則源自社會，受到實用主義影響，胡適指出主體性出

實，完全是個人對現實社會的回應。亦即個人的創造力必須由現實社會啟發，並非單單由天賜，同時胡適更利用白話文作為表達個體的工具，使白話文一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有力象徵。

上文把本書所收八篇文章的脈絡作一個大要陳述。這八篇文章的寫作，最初一篇創作於 1995 年，最後一篇則在 2006 年，都是學術研討會中發表的文章，因此寫的時候多半跟隨研討會的主題，並非依各論題的時間先後創作，只是在這次結集出版時才依序排列。雖然如此，各篇文章主軸仍圍繞個人一向關心的問題，亦即中國近代世界觀的轉變過程。然由於各篇原為研討會文章，寫的時間又相隔頗遠，故內容上有不少重覆雜沓之處，涵蓋面亦有許多遺漏地方，不過天下事難有十全十美，故今次結集出版，無論架構及文獻仍保留原樣，只有文字及格式稍作修改，不過要整齊全書，並不容易，錯漏地方，唯望讀者恕宥。

最近幾個月都為修輯各篇文章忙碌，有些論文年代久遠，連原稿都找不到，只好麻煩出版社幫忙，掃描重新整理。至今面臨出版，始感古人禍棗災梨之惶恐，只是孜孜多年，不敢說益世之作，只當雪泥鴻印，個人留為紀念。

2014 年 10 月記於台北

目次

序	6
第一章 有關辛亥革命評價的若干問題：	
由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角度的再思考	1
一、自由主義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2
二、民族主義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9
三、結論	14
第二章 儒家思想與清末對外關係：王韜與日本	16
一、十九世紀之世界與春秋時代	18
二、王韜對日本之開始認識	21
三、扶桑遊後對日本的認識	28
四、結論	34
第三章 世界史和民族史的交匯：康有為早期史學思想	35
一、歷史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出現	37
二、建立以歷史通則爲主的世界史	45
三、結論	50
第四章 從群體到民族：梁啟超民族主義的形成	52
一、維新變法與群體觀念的導入	54
二、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民族觀念的形成	64
三、結論	74
第五章 歷史文化的追尋：章太炎民族主義的形成	76
一、近代民族主義與現代群體意識的出現	80

二、由保皇到反滿：傳統政治秩序的崩潰	92
三、社會達爾文主義對章氏民族主義之影響	97
四、「以史爲界」之中華民族理論	105
五、儒家體制之再出發	113
六、結論	125
第六章 論清末學術中經學與史學的交替	127
一、經學崩潰的過程	129
二、經學與史學的交替	134
三、小學：一個新的歷史敘述形式	142
四、佛學：追尋近代主體性	152
第七章 國家的歷史性與自然性：省思辛亥的民主實驗	162
一、章士釗對英美政制的認識	164
二、戴季陶與章士釗間的爭議	168
三、歷史與自由的衝突	173
四、結論	178
第八章 歷史綿延性的中斷：新文化運動探源	181
一、辛亥革命之反思	183
二、胡適走上現代性的道路	188
三、社會與文學革命	202
四、結論	206

第一章

有關辛亥革命評價的若干問題： 由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角度的 再思考

有關辛亥革命的評價向來是爭議不斷。不過近年來對辛亥革命的爭論，多半集中於社會結構問題，爭議的重心是要論斷辛亥革命的社會屬性，與及是由那一個社會階級領導。大陸學者一直認為辛亥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革命，其領導者毫無疑問是當時之新出現之資產階級；而美國學者則認為辛亥革命是士紳或精英階層所領導。社會結構的論爭到一九八二年在芝加哥舉辦之辛亥革命討論會中達到高潮，張玉法教授在會上反駁大陸學者的資產階級革命說，主張辛亥革命是一個全民革命。因此有關辛亥革命的評價，「全民革命論」、「資產階級革命論」與「士紳或精英革命論」三者鼎足而立。¹隨著論爭的展開，有關辛亥革命的社會性質的問題已有十分深入的討論，本文不擬作續紹。但有關辛亥革命評價並不只限於社會性質，本文在這裡提出另外兩個觀點——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希望作為進

¹ 李金強，〈辛亥革命的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頁 776-781。

一步了解辛亥革命的參考。

本文提出這兩個史觀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社會結構史觀一直是流行於大陸及美國，但不是台灣史學界的主流，在過去五十年，台灣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主要是從自由主義及民族主義兩個角度出發，故要了解台灣過去史學五十年來的發展，必須要重新觀察這兩個史觀。其次，這兩個史觀不只是流行於台灣，並可以溯源到上世紀中國有關改革方向的爭議，並延伸至史學界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因此這兩個概念與民國以來之史學發展亦息息相關。本文希望藉這個題目作為了解中國近代史學發展的線索。當然，這樣大的題目非一篇短文能夠處理。因此只希望借此機會提出一些問題，拋磚引玉，希望能得到學界進一步討論。

一、自由主義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自由主義是歐洲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產物，但到二十世紀時，自由主義這一概念已進一步分化。由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之自由主義，一般稱為古典自由主義，而二十世紀之自由主義則稱為現代自由主義。所謂古典自由主義是指十七世紀以來的政治參予運動。古典自由主義本來最強調是人之理性，認為只要給予人類自由以發揮其理性，則人類進步是可期的。不過理性是一個抽象概念，在落實到社會時，自由主義者認為人類理性最高之表現在政治，故民主改革運動一直成為十九世紀自由主義者致力的重點。

到十九世紀末，歐洲各國的民主運動已逐步取得成果，全民選舉及政黨政治均已成為歐洲日常生活之一部份。不過，當

時的自由主義者卻面臨另一個衝擊——工業革命。歐洲各國之社會因工業化而改變，而社會的急速改變卻造成內部各種衝突，古典自由主義下之民主架構似乎無法有效應付這些問題。因此自由主義者不得不重新調整他們的立場。自由主義者沿用啟蒙時期以來之進步觀念，支持改革。但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政治及社會激烈手段。他們認為人類社會進步最大的障礙並非來自社會及經濟結構，而是傳統文化。因此革新必須先克服傳統。這種新與舊的對立，成為二十世紀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的行動綱領，亦成為其歷史觀之來源。²

在中國近代史裡，自由主義者亦認為傳統與現代的對立是中國改革的重大障礙。本文不擬對這一個熟悉的命題再加以分析。本文所要探討是這種傳統與現代的二分概念，是如何被自由主義使用到歷史研究中。作為一個個案研究，我是選擇了蔣廷黻對辛亥革命認識。

蔣廷黻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是無庸置疑，同時他更是一個出色的中國近代史學家，他出版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琦善與鴉片戰爭〉、《中國近代史大綱》等，均對中國近代史研究有很大影響。³他的歷史研究，有人批評其過於受時勢影

² 有關自由主義之發展過程，目前西方史家大概一致認為古典自由主義到十九世紀末已被西方揚棄。但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中朝那一個方向發展則有不同看法。有認為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是走向沒落，這看法可參考 Anthony Arblaster, *The Rise and Fall of Liberalism* (New York: Blackwell, 1984) 亦有認為自由主義在二十世紀已打跨其他極權思想，走上高峰，這看法可參考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本文對自由主義之解釋是個人對近代自由主義發展的一個綜合。如要參考西方對自由主義一個比較新而又扼要的說明，可參看 John Gray, *Liber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³ 蔣廷黻在北伐以後是屬於所謂「獨立評論」自由派，但蔣氏之自由主義立場